

东北下岗工人的边缘与失语——论双雪涛与王兵作品中的结构性沉默

杨逸凡

苏州大学文学院 22 级汉语言文学（基地班），江苏苏州，215000；

摘要：本文通过双雪涛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与王兵纪录片《铁西区》的互文性分析，聚焦东北下岗潮背景下工人群体的异化命运与失语困境。本文以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中李守廉的异化轨迹为中心，辅以纪录片《铁西区》中的影像材料，揭示东北下岗工人尊严在结构性暴力中逐渐被剥夺的过程。虚构叙事与纪实记录在这两部作品中形成深刻对照，共同构建起关于“失声者”的叙事伦理。

关键词：边缘群体；《平原上的摩西》；《铁西区》；失语者；结构性暴力

DOI：10.64216/3080-1494.25.06.048

1 结构崩塌下的空间——从铁西余晖到艳粉街现实

东北曾是中国工业化的先驱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却逐步式微。经历从“共和国长子”的荣耀到“下岗潮”的剧痛，这片曾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，承载了太多细碎的苦难。双雪涛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与王兵的纪录片《铁西区》分别通过虚构与纪实，以各自的方式勾勒出时代崩塌的残骸：工厂的停摆、家庭的搬迁、身份的丢失，以及在此结构性坍塌中个体所经历的物质与精神危机。

沈阳铁西区，在这个曾被国家大力支持的重工业基地中，工人不仅是劳动者，更被塑造为“英雄阶级”，享有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福利保障，几代人在这燃烧着数十年不熄的工厂之火。然而，这套体制终究难以抵挡时代变迁的冲击。自 1995 年前后起，大批国企连年亏损，开始“减员增效”、改制私有化，“下海”和“下岗”成为两条泾渭分明的命运路线：一批果敢者如庄德增，带着烟标南下经商，另一些人如李守廉——则在沉默中等待命运将他们边缘化^[1]。

双雪涛深知这场崩塌的核心在于体制空间的灭亡。他并未刻意渲染工厂倒闭的剧烈场景，而是用一种“失效而未亡”的日常叙事方式来描写正越滚越大的时代崩溃的雪球。小说中李斐回忆：“父亲依然按时上班，但是有时候回来，没有换新的工作服，他没出汗，一天没活。”^[2]这是“沉默的崩塌”的呈现：没有喧哗，没有抗争，一切如浮冰消融，悄然终结。

在《铁西区》中，这种“沉默的崩塌”则被转化为极具视觉张力的长镜头：冶炼厂炉火微弱，工人抽着烟投料，沉默不语，像是旧时代的雕像在缓慢剥落、碎裂。

片中一位老工人望着即将关停的厂房苦笑说：“这辈子就是在这过来的。”话未说完，但之后却是长久的沉默。这位老工人的沉默与未竟之语，象征了无数人被压抑的情感与表达的无奈，反映了个体在历史转型中的失语困境。

小说与纪录片共同呈现了东北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深刻变迁，那些曾被赋予历史使命的工人形象，在叙事中悄然退场，其身份与话语都被重新书写，昔日的辉煌逐渐沉入新的语境之中。

同时，小说中通过对炕塌的描写暗示了家庭空间的同步瓦解：“第一天搬进去，炕是凉的……塌了一个洞……我脸摔破了。”^[2]原本温暖的“炕”象征家庭的稳定，如今却冷寂、塌陷，从曾经整洁的职工楼搬入狭窄的棚户，原本安康稳定的家庭跌落至贫困边缘。与之互文的是《铁西区》中拍摄的艳粉街：纪录片镜头带我们穿过低矮的砖瓦房、拆了一半的墙体、电线散乱、孩子在泥地里奔跑，笑声夹杂着远处大喇叭催促搬迁的广播声。王兵以一种极致冷峻的方式“看着”他们，不评判、不干预，只让影像本身传递出生活的压抑与真实。

双雪涛在《纪实与虚构：文学中的“东北”》中曾提出：“对我来说，东北一方面是我内在的部分；另一方面现在它也是我的一个他者，我是努力地保持距离看待它。”^[3]在双雪涛的叙述中，艳粉街既是“故乡的隐痛”，又是时代转型中“异化状态”的隐喻。从体制的“乌托邦”到艳粉街的破落地底所，个体被迫从宏大叙事中彻底出走。

2 李守廉：从“好工人”到“嫌疑犯”——“被误解”的结构性跌落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中李守廉这一人物，可谓是体制

崩塌这场风暴中最具代表性的牺牲者。随着下岗潮到来，他的生活逐渐被撕裂，他被时代误判、被社会误解，最终成为冤案的“潜在嫌疑人”。这一人物的跌落，不是道德沦丧的结果，而是结构性暴力深植日常生活，冷峻而无声地完成的异化过程。

这里的“结构性暴力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显性压迫，而是如约翰·加尔通（Johan Galtung）所界定的那种“嵌入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压迫”，它通过制度安排、资源剥夺、文化否认等方式，使某些群体在看似和平与合法的框架下长期处于劣势地位。在李守廉的故事中，正是这一类不显性的社会性暴力，导致了他从“模范工人”滑向社会边缘。他的尊严被逐步抽空，甚至连解释自身遭遇的权力也被剥夺。在这种压迫机制中，个体的不幸并非偶然，而是结构运作下的必然结果。

在小说前面的描写中，李守廉带有一种“准英雄”的工人原型气质——正直勤恳、乐于助人。他“无私地把手艺教给两个徒弟”，会在广场见女摊主被欺负时挺身而出。他也会为女儿织毛衣，在寒夜中带着她去“看病”。他的形象既不宏大，也不边缘，而是日常生活中的“好父亲”“好人”。王德威称这类人物为“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中的幸存者”，他们沉默，却有着不肯为生活磨灭的尊严。

然而，这份坚持并未改变他命运的下滑，他的困境在丢失工人身份的那一刻就已注定。他的生活逐渐被现实挤压至极限，他努力维持“做一个正派人的姿态”，却只能愈发沉默、孤立，最终带着女儿走进了社会的阴影。这一形象的异化并非个人过失，而是“结构性贫困与制度性排斥”共同作用的命运结果。他没有犯错，却被认定为有错；没有仇恨社会，却被视作潜在的威胁。李守廉不仅是小说中的“被误会的人”，更是现实中无数下岗工人身份异化的写照。

在1995年平安夜的“误判事件”中，李守廉带着腹痛的李斐乘车，恰巧上了由便衣警察蒋不凡驾驶的车。因穿着破旧、目的地敏感、神情沉默，他被误判为嫌疑人。“男的皮夹克是黑的，有很多裂缝，软得像一块破布”，这句描述道出了李守廉“外貌的异化”，也是其被“他者化”的第一步，蒋不凡将他的贫困、沉默简化为“危险”“可疑”的表象符号。下车后他曾多次试图向蒋不凡辩解，可蒋不凡已打心底里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，剥夺了他解释的权利——他的“被动”不是性格懦弱，而是制度性失语的必然结果。

正如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（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）指出，“失语者”并非没有声音，而是在 hegemonic（霸权）的话语体系中，他们的语言被系统性屏蔽、误读或替代。他们的表达无法进入主流的理解

机制，无法构成“有效的语言”，最终沦为“沉默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李守廉的沉默并非出于个人意愿，而是权力机制对其发言权的压抑所致，是一种“他者化”的结果——他不被允许以“主体”的身份进入对话，仅被看作一个需要“处理”的客体。小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失语处境：李守廉始终没有获得属于自己的第一人称叙述权，他的故事总是经由他人的回忆与想象拼贴而成。这种结构并非作者的忽略，恰恰揭示了他被剥夺“自我表述”的现实。正如黄平指出：“每个人都只能通过他的视角，及其视角所联系的社会结构性的位置，来理解眼前的时代，理解他人。”

在此意义上，他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没有人再愿意听他说。他被剥夺了语言，也被剥夺了被理解的渠道。他的愤怒被误解为暴力，他的辩解变成威胁，但即使在极端困境中，他仍未滑向暴力的深渊，靠拉出租维生，以克制之姿守护女儿，以沉默抵抗命运。他的愤怒，是尊严无法被承认时的反应；而城管之死，则是他在失语处境中试图维护正义的绝望挣扎。《铁西区》中也展现了类似的“失语尊严”：一位老工人面对着镜头抽烟，烟头燃尽，他始终未发一言——这正是“失语的尊严”：不是消极的缄默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拒绝：不是不愿开口，而是知道“说也无用”。在这样的语境中，李守廉即使大声疾呼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不是社会的敌人，而是被社会拒绝理解、剥夺言说权利的“他者”。

正因如此，《平原上的摩西》没有为他安排翻案的转折，而是以更克制的方式致敬：小说最后，李守廉依然沉默，真相却在女儿的回忆中得以“重现”；而《铁西区》的镜头，也从不替他们发声，而是耐心记录他们的沉默。这种沉默，正是最大的控诉。那种无声的存在感，并非出于自愿，而是被结构性的压迫剥夺了发声的空间。

3 虚构与纪实之间：何以书写“说不出”的现实

面对同一片土地上的社会断裂，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与《铁西区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：一个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叙事，一个是长镜头无干预的纪实影像。这种文学与影像的对照，在本质上构成了对“边缘人如何被记录”的追问。

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斯曼夫妇（Jan & Aleida Assmann）认为，记忆不仅存在于私人经验之中，它还依托文学、影像等“记忆媒介”得以外化、储存与传播。这些媒介使本被排除于叙事之外的边缘记忆重获可见性，形成所谓“存储记忆”（storage memory），并进入集体身份的构建过程。在这一意义上，《平原上的摩

西》与《铁西区》更构成了对下岗工人群体性记忆的修复与文化见证。两者作为记忆载体,在形式风格和伦理立场上的差异,不仅体现出不同媒介对沉默历史的表达方式,也呈现出边缘个体借由文学与影像重新进入社会记忆视野的过程。

在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中,双雪涛采取了多视角叙述策略,构建出一种“碎片拼贴式”的结构美学。这种叙述策略不是追求线性再现历史真相,而是呈现历史在不同个体经验中的断裂状态。读者不得不通过庄树、李斐、傅东心、庄德增等人的叙述,不断重建李守廉的轮廓,这种“不断接近却永不完整”的过程,正是对下岗时代“真实而不可复原性”的表达。

相较之下,《铁西区》的结构更加激进:王兵几乎取消了配音与剪辑解释,只保留长镜头拍摄下的“原生态语境”。无论是工人烧锅炉还是父子拾荒的场景,他都用一种极端克制的影像态度,将情感交还给观者。这种“非故事性”的结构,是对纪录片伦理的坚守,也是一种选择——王兵拒绝为工人申诉,而是让他们用“沉默”本身完成叙事。

尽管手法迥异,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与《铁西区》都表现出高度一致的伦理倾向:它们都拒绝“边缘人”进行浪漫化抚慰或残酷化渲染,而是通过平静、甚至冷峻的描绘,让“他们”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叙事空间中。这是一种对“非主流生命”的尊重。

双雪涛和王兵都明白,在宏大叙事退潮后,那些在现实中被污名化、失声化、工具化的人,其命运往往不具备“可叙性”。他们没有光鲜的身份,甚至语言本身也无法精确传达苦难。这时候,文学和影像便承担起叙述他们命运的使命。李守廉,就是这样一个被叙述的主体。在小说中,他未说出自己的故事,但他的沉默拼合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困境;而在纪录片中则不需要借助虚构来完成意义的建构,镜头中工人们存在即事实,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转型中最沉重的“事实陈述”。

最终,文学与影像作品所构筑的不仅是叙述方式上的分野,更是对“谁能说”的伦理发问。《平原上的摩西》虽然以警察、知识分子、商人等“拥有话语权”的角色视角叙述李守廉,但作品并未因此消解对边缘人的同情,相反,这种“间接叙述”更凸显了他们失语的深度。小说的力量,不在于李守廉是否申冤成功,而在于它让读者体会到——我们正在阅读一个“没有自己声音”的人的故事。而《铁西区》的力量,则在于它强迫观众面对这一现象本身。它不提供解释,而是通过沉默而无言的脸庞,逼使我们承认:这些人不需要我们理解,只

需要我们记住。李守廉并不是王兵镜头中的“某一人”,而是他们全体的化身。他身上寄寓了被遗落的人群的共同命运,他的沉默即他们的沉默,而他的悲剧也正是那一代人整体被忽视、被简化、被遗忘的社会性缩影。

4 结语

双雪涛没有为李守廉写下翻案的高潮,而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沉默,为他刻写人性的轮廓,他只是像那个时代的千万人一样,悄无声息地退场,只留下无人记录的背影。而王兵也没有让镜头介入太多,只是让他们沉默着。在这条由沉默锻成的路中,蒸汽已冷,铁轨弯曲,尘埃替代了时间的流动,走在其中的李守廉不再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,而是一个时代的隐喻,更象征了那段被遗忘、被压低、被误解的集体命运。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与《铁西区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呈现时代的失落感,更在于揭示一种文学与影像共同承担的社会记忆功能。双雪涛通过人物“失语”策略与片段式叙事,将李守廉塑造为结构性暴力下的“非言说主体”;王兵则用无声长镜头捕捉工人生活的空白与静止,让观者直面真实的历史沉默。两者共同指向文学与影像的共同价值——为这些“被遗忘的人”提供一处记录与再现的空间。李守廉的形象由此超越了文本中的个体叙事,他代表了整个90年代下岗潮的边缘群体。他的沉默,不仅是一种被迫的无言,更是一种深刻的质问——时代踏步向前,而失语者如何证明他们曾存在的证据?这种质问赋予文本以独特的批判性,使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不再是个人悲剧的叙述,而成为对集体失落、社会转型的深层追索。

因此,我们可以认为,虚构叙事与纪实记录的使命不仅是讲述故事,更是保存那些“无言者”的存在,使他们不至于彻底消失在历史叙事的边缘。在杰弗里·亚历山大(Jeffrey C. Alexander)的文化创伤理论中,创伤并不只是一种个体经验,而是一种需要社会性“讲述”才能被认知和治愈的群体记忆。双雪涛与王兵的作品中对边缘群体的再现,已不仅是审美选择,更是对这种沉默创伤的文化见证与叙述尝试。

参考文献

- [1]刘珊彤.个体与群体的时代性:读双雪涛《平原上的摩西》[J].名作欣赏,2021(9):78-79,100.
- [2]双雪涛.平原上的摩西[M].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16.
- [3]鲁太光,双雪涛,刘岩.纪实与虚构:文学中的“东北”[J].文艺理论与批评,2019(2):23-35. DOI: 10.16532/j.cnki.1002-9583.2019.02.003.